



# “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湖南湘潭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湘潭烈士陵园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陵园路30号，占地约28亩，201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烈士纪念馆。陵园中轴线上矗立着湘潭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坐西朝东，由碑座、碑身组成，碑高19.49米。碑后是长27.5米、宽1.5米的英烈墙，墙上镌刻着登记在册的1980名为国捐躯的湘潭英雄儿女姓名。碑身正面镶嵌着毛体黑底金字“湘潭烈士纪念碑”。碑座刻有《湘潭市烈士陵园碑记》，全文如下：

湘潭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百余年来，湘潭人民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英雄事迹，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的教育，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烈士墓”改建为“湘潭市烈士陵园”，并树碑辟馆，供人们瞻仰。

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崇高的思想情操，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曾激励过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去夺取胜利，也必将鼓舞一代一代的后来人去实现他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

中共湘潭市委  
湘潭市人民政府  
提质改造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碑文简洁地介绍了湘潭英雄儿女创造的光辉历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无限的缅怀之情。敬读碑文，不禁思绪万千，深受教育鼓舞。

1905年，湘潭县城被辟为帝国主义的“寄港地”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进入湘潭，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潭青年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新民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组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些组织的引领下，湘潭的先进青年奔走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23年，



湖南督军赵恒惕对工人运动实施镇压，新民学会会员陈子博决心为民除害，于是他身藏两枚炸弹，向敌人的车子投去，但仓促中未击中。赵恒惕下令全城搜捕，陈子博藏入民宅粪池内躲了3天，最终因中毒不幸于1924年1月逝世。毛泽东亲临追悼会并致哀，挥笔写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挽联，以悼念这位才华横溢、斗志坚强的共产党员。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中共湘潭地方组织迅速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积极推进国共合作，推动和领导湘潭人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赵恒惕疯狂屠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湖南农民运动领袖汪宗组织农会，公开号召农民驱逐赵恒惕，最终因敌人诬陷被捕，于1926年2月被害，成为湖南第一个牺牲的农民运动领袖。1927年马日事变后，湘潭农民揭竿而起，踊跃参加工农义勇军，发动湘潭起义。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反动派用各种手段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瞬间笼罩湘潭。短短20多天里，湘乡被杀戮的人数达300余人，工农革命组织全被打散。9月，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

军参谋长兼一支队队长庞叔倪受湘潭党组织派遣去安源途中不幸被捕，于10月27日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湘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但是，湘潭儿女没有屈服，积极配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年关暴动除“三害”、开展“护校”斗争等，发扬“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继续革命。1928年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参加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5月，她在作战中负伤被捕，次年8月20日英勇牺牲。毛泽建在遗书中写道：“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经常派出飞机对湘潭进行狂轰滥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湘潭人民纷纷抗日。惠景医院举办救护训练班，为抗战前线培养救护人员；湘潭县立中学的学生发起收集破铜烂铁的活动，提供作为制造军械的原材料；妇女励进会组织妇女上街征集衣物支援前线；商界人士主动封存日货。1944年6

月，湘潭县、湘乡县相继沦陷。中共党组织迅速安排中共党员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与日伪政权抗争。湘潭县工委积极争取和领导了两支抗日游击队；湘潭群众积极为抗日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参加破路、拆桥等活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湘乡县共有57505人服役，有5349人在前方阵亡，2042人在战争中负伤。由于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湘潭沦陷的日子里，广大农村仍掌握在人民手里，达到了抗日保乡的目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内战，企图恢复独裁统治。中共湘潭地方党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积极开展城乡工作据点，建立群众工作基础。在城市，发动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开展“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三抗”斗争和农村游击武装斗争。从“银城起义”开始，湘潭党组织领导的队伍采取游击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周旋达半年之久，产生了如胡佑生、张鹏飞、谭荣华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正是在这些英雄儿女的浴血奋战下，1949年8月9日，湘潭终于获得和平解放。

(赵旭 吴宇航)

战争岁月

庾家河战斗：

## 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堵计划

——殊死血战庾家河

1934年12月初，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一路艰难转战，冲破敌人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向陕西南部挺进。

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击溃陕西守关团后，进入陕南境内。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入秦岭山区小镇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宿营。

庾家河，地处洛南、商县、商南县的接合部，山高林深，地理位置颇有特点。当地人称“炉道梁上一滴水，黄河流长江”。因此地是高山，一边的水向北流入洛河，最终汇入黄河，而另一边的水则流经密庄、商南，注入丹江，最终汇入长江。

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一间名叫“春茂水”的中药铺里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研究在鄂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当日午时，会议正在进行。突然，从庾家河街东山坳口方向传来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次来袭的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师。该师原为国民党军第十九军旧部，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原来，蒋介石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在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时，就令驻开封的第六十师先赶至灵宝，又经200余里行军，到达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五里川一带，并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逸待劳，堵截红二十五军。此时刚升第六十师师长不久的陈沛，很想在这次堵截红二十五军中再立功，因此格外卖力。

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发现敌布防后立刻改变了入陕路线，来了个声东击西，让手枪团迷惑敌人，主力“暗度陈仓”，沿着一道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一路马不停蹄，往陕南方向而去。得知红二十五军已进入陕南后，敌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立功心切，越过省界，率部从鸡头关方向尾随而来，并从七里荫的山路迂回至庾家河街东山坳口。

红二十五军设在庾家河街东山坳口的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已从七里荫迂回上来，当即向敌开火。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旋即赶到，投入战斗，并派人向省委送信。省委得信后，立即中断会议，军领导迅速上山指挥战斗。徐海东奋勇当先，率领第二三团立刻前去增援。

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六零团已经攻

占了东山坳口，并凭借有利地形，接连不断地发起猛攻。如果挡不住这波进攻，红二十五军就会被压制在山沟里，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徐海东指挥第二三团奋勇抵抗，反复冲杀，终于艰难地夺回了东山坳口。程子华、吴焕先率领的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随即赶到，迅速占领坳口的南北两侧高地，协同第二三团击退敌人的进攻。激战中，一颗子弹飞来，从徐海东眼睛下方穿过，又从颈后飞出，他满脸是血，当即昏了过去。

午后，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第三五五团、第三五七团增援上来，轮番向我军发起冲锋，双方在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场上，正举望远镜观察敌情的程子华，被射来的子弹一下打穿双手，鲜血直流，十分危险。

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吴焕先继续指挥战斗。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奋战，以大刀、刺刀、手榴弹，与敌进行拼杀。

战斗过程中，一颗子弹飞来，击中军部司令程子华的下颚。顿时，程子华满脸是血，无法再吹军号。但是，他没有停止战斗，而是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忍着剧痛，向敌人投出数十枚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英勇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斗中，我第二二四团第七连在与敌火力对射中连续牺牲3名轻机枪手，我官兵前赴后继，最终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冲锋在前，率部与敌肉搏时，一条腿受了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昏迷过去。

战至黄昏，红二十五军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打垮敌军。残敌趁着夜色向卢氏方向撤退。庾家河战斗，共毙伤敌300余人，红二十五军伤亡100余人，多名团营以上干部受伤。此战后，被打穿双手的程子华，虽然经及时救治捡回了一条命，但双手久久不愈，落下了终身残疾；身负重伤的徐海东，则整整昏迷数天才苏醒过来。

庾家河战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追堵计划，迫使尾追的国民党军不得不退回河南，红二十五军进军陕南取得了重要胜利，为在鄂陕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尹霞)

中华英烈★★

## 李时雨：深潜十五载 屡屡立惊涛



李时雨原名李亨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29年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东北军，任“剿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他传奇的潜伏生涯。李时雨从中尉办事员一路升到国民党少将，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等要职，成为隐藏在敌人上层核心部门的红色“窃听器”。

### “爱慕虚荣”运电台 销毁案卷救同志

1937年7月，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来了一位从西安“剿总”调来的年轻“书记官长”，他就是由党组织安排

到天津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李时雨。

此时，天津党组织从英法租界外国人电料行中采购了一批电台机械和设备，急需送出天津。李时雨手头上虽然有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由凶恶的日本军警把守，想把严格禁运的三大箱电台设备送出去，实非易事。

正当李时雨苦思冥想时，接到了妻子孙静云的电报，李时雨眼前一亮。他来到伪高等法院院长家中，表示想“充充面子”，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车站接妻子。院长本就对李时雨十分看重，便欣然应允了他这个“爱慕虚荣”的请求。李时雨借到车后，打着院长的“大旗”，顺利通过“法国桥”。

但是运送第三个箱子时，李时雨没有理由再去借车，只得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经过“法国桥”时，三轮车不能过桥，李时雨便一手提箱子，一手拿“派司”，昂首挺胸混在人群中，看似轻松潇洒，让日本人以为箱子不重，“大摇大摆”地将电台提了出去。

地下党员冯骥被捕，伪法院已掌握了一些证据，营救难度大。经深思熟虑，李时雨利用书记官长有检查案卷之权，借检查康性书记官工作之名，趁其外出抽出了冯骥全部案卷，带回家中付之一炬。过了几天他又去检查，点名要看冯骥的案卷，康书记官自然找不到。正在着急之时，李时雨“善意”提醒是不是被前次日本人炸丢了，康书记官怕受责备，连连称是。既已销毁了案卷，李时雨便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

的亲戚，乃是被诬陷入狱，多次暗中活动后，冯骥被无罪释放。

### “平步青云”获密报 抢盖大印送武器

1939年，汪精卫加快投敌卖国步伐，在上海筹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策划建立伪政权。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由朱晶华等3人负责平津“选区”。朱晶华到天津后，经曾任东北联军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介绍，见到了李时雨。朱晶华把这个法学家网罗为代表。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

1939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交谈中，汪精卫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这是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也被李时雨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直接在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手下工作。李时雨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时雨为党部常务委员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授少将军衔。1942年5月，李时雨接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

为对我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兼任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任命李时雨兼任第四处处长。有了职务之便，1942年12月，李时雨及时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军政部”秘密制订的春季“清乡”计划送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依照情报提前部署、抢先行动，使日伪军首批“清乡”计划惨败，他赞扬李时雨提供的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李时雨兼任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身兼汪伪政权三大处处长，一时间，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在汪伪政府走向末路、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李时雨抓住时机，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上司令部大印，直接从保安司令部军火库中提取出20支德国手枪、100支美国卡宾枪、两种子弹各3万发，堂而皇之运出上海交给新四军。

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特务逮捕，严刑拷打也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候审。1949年4月，公开身份的时雨终于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魏安仁)

军史文物

## 见证志愿军官兵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军号



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使用过的军号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着一把军号。它长33厘米，表面覆着一层铜锈，在灯光的照射下，表面的划痕、凹印以及边缘处暗绿色的斑痕锈迹清晰可见。这把军号是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军号。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一举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勇猛地向南追击。1951年1月2日，敌军全线败退，志愿军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在志愿军全线追击的过程中，英军来复枪团占据了釜谷里一线阵地，利用有利地形对我军进行阻击，以掩护其主力部队撤退。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主力奉命断敌退路，其中第一一六师第三四七团接到了攻占汉城以北40公里的釜谷里的命令。

3日凌晨，志愿军率先攻占了釜谷里南山阵地，卡住敌人退往汉城的道路。随后，志愿军遭遇敌军猛烈反扑，为歼灭敌军，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

师第三四七团第七连奉命抢占并坚守位于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经过一番激战，我第七连攻占了制高点。

敌军不甘心丢失这一阵地，随即组织了大规模反扑。在敌军猛烈炮火的轰炸下，工事和掩体几乎被摧毁殆尽。我第七连官兵来不及设防，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弹坑成了一片地上的防御工事。志愿军官兵在一片片泥水中抵御着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激战，他们击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但第七连也遭受惨重伤亡。连长厉凤堂身负重伤，指导员、副连长、排长全部牺牲，最后全连只剩下司号员郑起和其他几名战士继续坚持战斗。倒在血泊中的连长将自己的手枪交给郑起，让他去指挥战斗。郑起挺身而出，接替连长进行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下，敌军在坦克的支持下，再次发起攻击。面对敌人的进攻，郑起把全连仅有的战士组织起来，在把仅存的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弹投向敌人后，爬出战壕，吹响了军号。冲上来的敌军一愣，误以为我军大部队已经赶到，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战场上形势陡转，敌军被随后赶来的志愿军主力歼灭。

战后，郑起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他使用的这把军号，见证了志愿军官兵的英雄血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朱坤 黄池敬)